

袁伟时

历史哲思录①

缠斗

方生与未死

东方与西方，知识与权力，精英与大众
在缠斗中，拾回常识，融入世界文明

袁伟时 ●

线装书局

缠斗

| 方生与未死 |

袁伟时 ●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缠斗：方生与未死 / 袁伟时著. — 北京：线装书局，2012.11

ISBN 978-7-5120-0730-7

I. ①缠… II. ①袁…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通俗读物 IV. ①K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58549号



著 者：袁伟时

责任编辑：杜 语 孙嘉镇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100009)

电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640mm × 960mm 1/16

印 张：22

字 数：286千字

版 次：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定 价：38.00元

自序 告别虚妄 维护历史的尊严 / 001

第一辑 回顾风波 / 003

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 / 004

李鸿章：几个无可辩驳的史实 / 017

太平天国：“中国魔鬼”的化身

——答《世纪中国》记者张文中 / 025

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

——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 034

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

——答容若先生 / 046

“史实”与“更惨”

——敬答谢蔚明先生 / 066

第二辑 另眼看人物 / 076

康有为思想转变的当代启示

——答《深圳商报》记者夏和顺 / 077

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成就与罪错 / 083

袁世凯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

——答彭晓芸问 / 105

多维视角下的大元帅府和中山舰 / 117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

——蒋介石在1943年 / 120

宋美龄：历史与神话之间的探寻 / 137

那个被误解了一个世纪的人

——胡适120周年诞辰答《深圳特区报》记者问 / 150

傅斯年：学术领袖·教育家·反腐“大炮” / 155

觅路的艰辛与清障的功勋

——20世纪中国历史框架下的邓小平 / 172

历史机遇与历史眼光：再说邓小平 / 181

第三辑 另眼看时代 / 190

1899留给中国的启示 / 191

二十世纪的启示 / 196

回顾二十世纪 / 202

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 / 212

寻找历史的脉络

——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 241

重新审视北洋时代 / 269

抗战：文明的进展与中国的反思 / 289

第四辑 中日关系纠结 / 299

甲午战争：中日双输的历史教训

——答《经济观察家》报记者李翔 / 300

近代中日关系冷思考 / 319

多维回眺近代中国 / 328

附：把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答《深圳商报》特约记者汤万君、魏甫华先生 / 332

自序： 告别虚妄 维护历史的尊严

一场追寻历史真相的热潮，正在中国大地蔓延。这个令人欣慰的浪潮，出自人的求真本能，也是对清末民初以来政治家或政客以历史为刍狗的反抗。

中国文化有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传统：“疾虚妄”！

其倡导者是两千年前的王充。面对独尊儒学和谶纬迷信风行，他大声疾呼：“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论衡·自纪篇》）“案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篇》）深思细想，如果没有忘掉这个传统，20世纪的中国人，可以避免遭受多少苦难！

1985年，我的第一部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杀青后有感，信笔写下几句话：“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三十多年来，“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是我执著的追求。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的学术生涯从此屡有风波相随。

虚妄是人造的。构筑华丽或壮烈的故事，始作俑者往往宣称这就是正义；追随者多半出于思维偏激，某些人则渴望从中分一杯羹。从学术文化层面看，谎言是渣滓，最终会变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把谎言奉若神明，不过是社会病态的表征。

人，总有一点热血吧！面对虚妄，沉默还是道破？说穿了，有人会暴跳如雷，通常还有阴招伺候。可是，没有对固有结论的挑战，人云亦云，倒来倒去就是那几句，个人自然安逸，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就全部付诸东流了！不说，社会责任感安在？内心如何安宁？

嘴巴总要吃饭、说话，意见纷纭是常态，虚妄也是多元中的一元，各种观点的纠缠无可避免。制造虚幻与求真的缠斗不可能止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进入21世纪，虚妄的破灭在加速，各界泰然接受，没有激起旋风、巨浪。多年来，笔者参与了戳穿泡沫的过程，有时招致始料不及的反应。不过，不管潮涨潮落，我的心情都特别宁静。说的是陈年旧事，结论有根有据；没有亵渎自己的良知，维护的是自己的尊严；追求的是迟来的中国梦：人人可以自由说话、自在生活，以文明和蓬勃创新的高大身影赢得举世尊重的一流大国。任何纠葛都妨碍不了按时漫步校园、伏案工作和呼呼大睡！

应该特别说明，书中涉及的具体人，都与笔者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他们不幸成了某种观点或思潮的俘虏。彼此的分歧，说到底是不是思潮不可避免的论辩。观念变革是社会变迁的先导或侧影。从更广阔的层面去观察，最近几十年的思想文化冲撞，不过是现代文化与尚未消逝的思潮的缠斗。这部小书收集的文章，是这个尚未止息的过程的侧影。是耶，非耶？留待历史和读者去审判吧！

2012年12月5日

第一辑

回顾风波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
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
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
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
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
地回归学术。

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

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风靡海峡两岸开始，重写晚清历史和人物在史学界和文艺界蔚然成风，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走向共和》受到热烈欢迎，又令这一热潮升温。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也因对晚清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提出一系列崭新的看法，至今仍受到许多读者关注，有的读者说：“翻了许多大案，令人震撼。”怎样看待这一学术和文化现象？

所谓“翻案”的实质

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完全可以虚构，把《三国演义》看成《三国史》那不过是笑话。可是，这

次《走向共和》深受观众欢迎，却明显带有重新发现历史的意味。这与20世纪中国政治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息息相关。

任何学术结论都是相对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研究在内，本来就应如胡适所说“在不疑处有疑”，不断推陈出新，抛弃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不存在什么翻不翻案的问题。可是，自从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用政权力量取消了学术和思想自由，就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

1. 神化领袖人物，并以拥护还是反对他们作为是非标准，篡改历史。

例如，认真研究过有关史料的人都知道，1922年的所谓陈炯明叛变，其实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推行武力统一的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谁是谁非可以从容讨论（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公众舆论都认为正确的是陈炯明）。但为了神化孙中山，国民党却认为陈炯明是“叛变”乃至“叛国”，组织御用文人编造出一部《陈炯明叛国史》，并且不准人们说半个不字，1922年以前陈炯明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也一笔抹杀，历史就变为一笔糊涂账了。而随着多年来官方审定的教科书的灌输，人们习非成是，听到真实情况评述，反而觉得是奇谈怪论。

2. 由于没有言论自由，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

如吴晗笔下的朱元璋，抗日战争时期好些人骂袁世凯、曾国藩，揭露明代的特务统治，其实都有影射蒋介石的企图，有的就不免有过头之处。又如，为了抗议国民党独裁统治对文化的摧残，人们热衷于写乾隆爷统治年代的文字狱；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对皇帝更是贬损唯恐不及；于是，18世纪中国和乾隆皇帝的全貌自然就模糊了。

当《戏说乾隆》之类的影视剧推出后，新鲜感便油然而生。

3. 以历史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大清帝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在孙中山口中，却是“外国人”灭亡和占领中国的历史。孙中山说：“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①为了动员人们为推翻清帝国出力，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统统被戴上汉奸帽子！

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曾风行一时，蒋、宋、孔、陈是四大财阀几成定论。这对动员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腐朽的统治起过很大作用。可是，离开大陆后，陈立夫在美国靠养鸡活命，太不像财阀了。

4. 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贬低统治阶级的历史人物。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思想指导下，有些史学家往往有意无意贬低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家和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的贡献，乐于抬高劳动人民的作用。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又是对历史真相的掩盖。

5. 为动员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全盘抹杀外国人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贡献。

19世纪中国内地最早的现代报刊是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响最大的报刊是《万国公报》，都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当时的新式教育和对西学的介绍，也无一不依靠外国人。时

^①《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1页。

至今日，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史家们，无不肯定它们的成就。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论著仍把为这些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外国人，一概视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律称之为文化侵略！

多数中国人离开学校后，很少重读历史。认真研究史料，从愚弄人们的历史谎言或史家们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弄歪了的历史图景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力求将真实情况介绍给读者，这样的翻案有利无弊。借助小说、影视，普及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十分有益。这件事迟早都要做，今天的热潮毋宁说来迟了一点。

让我们从几个公案看看葫芦僧如何乱断葫芦案，就会对“翻案”的是非得失有进一步的了解。

太平天国公案的由来

太平天国研究历来有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派。这是正常的不同学术观点之争。但政治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了。

开其端的是孙中山。在他看来，“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因而命追随者编就《太平天国战史》，并赞之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换句话说，赞扬太平天国就是赞扬革命，就是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中国共产党崛起后，不少史家沿着孙中山的思路踵事增华，并摘引马克思的话以证明太平天国确是一场革命。以后进一步推到极端，一部近代中国史被说成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的历史。直至今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的标准教科书，还是跳不出这个窠臼。

可是，不但义和团怎么说都与革命不搭界，太平天国是否称得上革命，也大有疑问。

从理论上讲，洪秀全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经济上实行彻

底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公有制，“物物归上主”，实行一切财物归公的“圣库”制度；政治上则规定从最基层到中央，层层实行绝对的专制统治，政教合一，军政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百姓的劳动、教育、日常的一举一动全都在基层官员严密监控之下进行。总之，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军事化社会。洪秀全更申明，“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只有子错没有父错，只有妻错没有夫错”，“妻道在三从”，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面情不欢喜”“有喙不应声”都“该打”！明白无误是坚持三纲。从社会发展的眼光看，哪里有什么革命气息？

从实践看，更为荒唐。占领南京后，军政官员骄奢淫逸、贪污腐化，无所不为；杀戮臣下，互相残杀，血流成河；愚弄百姓，掠夺财物，劣迹斑斑；摧残文化，烧书删书，激起公愤。一般士兵夫妻不能团聚，军政官员则按级别分配女人，无不妻妾成群。这样的造反集团，哪有不覆灭之理？说他们比清帝国的统治集团更为进步，甚至不惜为他们加上一袭革命外衣，真是匪夷所思！

有人以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作为他们思想先进乃至革命的根据。《资政新篇》确实是非常卓越的先进思想文献。洪秀全写下31条批语，除4条有所保留外，其余都写上：“是”或“此策是也”。洪仁玕1859年到达天京，20天后就受命掌理朝政。要是真正按他的思想办事，太平天国的历史确实可能改写。可是，洪秀全连当时可以立即施行的如改进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一些建议都不予理睬。从1859年4月到达天京到1864年6月太平天国覆没，洪仁玕生活在其中五年，权力较大的时间只有一年半，1861年2月后的权力便一再削弱，眼见大厦将倾而无能为力。以他的思想作为判断太平天国性质的根据过于勉强了。

有的史家还以马克思的赞扬作为肯定太平天国的根据。对现代学术来说，某一先哲的语录本来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根据，何况马克思学派对太平天国的否定，最早和最彻底的就是来自马克思本人。这场战争的初期，马克思确实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对情况有更多了解，这位大思想家极其悲愤地作出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记事》1862年）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国不过是腐朽与丑恶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他原认为是“革命”的太平天国之战，不过是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的新尝试；这种局面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停滞，未有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必然产物。

延安时期的两个曾国藩

再看看曾国藩的有关情况。评述曾国藩研究不能不谈及一篇著名文章，即范文澜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此文作于1943年，研究者通常认为它是借古讽今之作，是影射当时的蒋介石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与侵略者勾勾搭搭。可是，由于过分急功近利，这篇文章的一些结论在学术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例如，范老拾孙中山的牙慧，以替清廷服务而断定曾国藩是“出卖民族的汉奸”，是“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他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靠汉奸。”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确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汉奸卖国史。

曾国藩是不是特别残忍的刽子手呢？1851—1865年间，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残酷的内战，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6%。从现有史料看，只能说双方的责任在伯仲之间，把这说成是曾国藩特别残忍的结果，未免肤浅和偏激！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就在范文澜大骂曾国藩的同一年，毛泽东却在延安“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与此同时，八路军《军政杂志》全文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供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学习，并且于1945年重版发行。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他的首肯，此事是办不成的。

但历史挺会捉弄人，延安的这类让不同观点并存的现象被人们淡忘，致使20世纪80年代至今还曾氏本来面目的努力，居然被不少人认为是新鲜的“翻案”文章。

李鸿章的“汉奸”“卖国贼”帽子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被全盘否定的历史人物。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

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伍！1901年，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不久，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条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

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齟齬。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